

普京的选项：经济颓势下的外交强势

程 伟

【内容提要】 发展与安全是普京治下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两大核心要件，而捍卫、发展国家利益，是俄罗斯旨在实现普京强国战略终极目标的基本着力点。普京总统曾经有过发展利益优先的实践，且成就斐然。2012年他重返克宫后，出于多重考虑，一改先前在安全利益上低调以求尽快放大发展利益的套路，转向直面美国的强势外交，以至于以不惜发展利益的暂时受损为代价。外交强势的后果可谓有得有失，俄罗斯仍然面临发展与安全的双重挑战，然而，当下面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发展利益端。综观俄罗斯内外部局势的演进，普京政权对于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二者关系的摆布，很有可能将进入到一个向回归前者调整的新的拐点。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方略 国家利益 外交强势

【作者简介】 程伟，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 言

2012年5月7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开启了他的第三任总统执政生涯。在业已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俄罗斯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了反差明显的两个现象，一是经济颓势，二是外交强势。

四年多来俄罗斯的经济颓势，经历了从增速下滑到增长停滞、再到经济衰退的持续恶化过程。增速下滑与普京总统的复任高度契合，始于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3.0%，低于全年3.4%的平均水平，第四季度再降为2.1%；2013年，GDP增速进一步降到1.3%；2014年，GDP增速仅为0.6%，基本陷入停滞状态；2015年，GDP为负增长3.7%。

与经济一路下行态势截然相反，此期间俄罗斯的外交强势则是持续升温：2012年9月，即普京复任总统职务仅仅四个月后，俄罗斯在海参崴迎来了APEC峰会。俄罗斯为此次峰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210亿美元，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那是一次“最豪华的APEC峰会”。俄罗斯如此看重普京“王者归来”后的首次外交展示，客观上折射出了即将出现的外交强势信号；2013年8月，俄罗斯政府正式向美国恨之入骨的斯诺登提供庇护，稍后，又成功说服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使其允诺在国际监督下销毁自己国家叙利亚的所有化学武器，从而迫使美国放弃了原本打算实施的所谓“惩罚性轰炸”。这两件事都表明，俄罗斯开始将其外交强势的选项付诸于行动；2014年，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乌克兰危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积极应对，主动出击，迅速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并竭力运作将乌克兰的东部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可谓直截了当地宣示了自己的外交强势；2015年9月底，应叙利亚当局的支援请求，俄罗斯开始在其境内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军事行动，又一次展示了外交强势选项的立场。纵观事态的发展不难发现，俄罗斯外交强势的矛头所指，主要是当今世界唯一具有超级实力的美国。

很难说俄罗斯的经济颓势主要源于外交强势，但其外交强势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普京决策团队迄今仍在坚持外交强势。人们不禁要问：再度登上总统宝座的普京缘何作出直面美国的强势外交选项，以至于不惜经济颓势的日益加重而继续坚守？本文试图以学理和实证兼容的方法来解析这一事实上并不简单的问题。

一 普京强国战略中的国家利益

普京治国理念的核心是“强国”，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与“强国”具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在联系。

（一）普京强国战略的由来

1999年12月30日问世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是普京治国理念较为完整的展示，也是体现普京十余年来执政方略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文章中，普京首次提出了“强国”的概念。有必要指出的是，普京当时提出的“强国”，并非为了直接瞄准或者立即锁定国家未来的发展目标，而是主要基于以此为核心

构建俄罗斯思想体系，进而从速动员起社会支持力量的迫切现实需求之考虑。

叶利钦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虽然俄罗斯制度转型的方向不被逆转已成定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但经济衰败、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思想混乱等诸多问题十分严重，俄罗斯民众整体上处于失望、冷漠以及怀旧的负面心理状态之中。鉴于此，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俄罗斯政坛新星——普京，把提出“俄罗斯思想”作为凝聚民心的精神食粮视为首要。在他看来，俄罗斯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这样四个构成要素。爱国主义，“这是一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更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强国意识，“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国家观念，“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社会团结，“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更重要”^①。在这四个构成要素当中，强国意识是俄罗斯思想的精髓，而其他三要素都是为之服务的，即：要把俄罗斯建成强国，爱国主义是前提条件，国家观念是重要保障，社会团结是基本依靠。

不难看出，普京治国理念中的“强国”概念，最初是作为具有内在关联因素的、属于思想意识范畴的话语出现的。普京深知，只有当以强国意识为核心的俄罗斯思想得到国民普遍接受或者广泛认同的时候，才易于将强国意识转化、提升到强国战略的层面。客观情况是，普京倡导的俄罗斯思想一经提出，立即引发来自社会各界强烈而积极的反响，于是，强国意识迅速生成为强国战略。

直观地看，普京提出强国意识抑或强国战略，不过是秉承了俄罗斯民族历史基因的一种自然反应。从彼得大帝的沙皇俄国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始终充斥着统治者强国雄心的诉求与梦想。但如果仔细探究，还会发现更为深刻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执政时的主要诉求有两个，一是确保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进程不被逆转，二是竭力融入西方世界，能像自己的原东欧小兄弟国家一样，成为西方民主文明大家庭中的新成员。他的第一个诉求基本上实现了，而他的第二个诉求，则被无情的事实击了个粉碎。暂且不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是否还继续把从苏联废墟中虚弱走来的俄罗斯视为敌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压

^① 《普京文集》（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东亚研究所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根儿没想把俄罗斯作为朋友，也没有将其排除在未来潜在威胁的对象国范围之外。由此，尽管西方社会基本认可叶利钦主政下的转型方向以及转型议程，也对俄罗斯表现出来的融入西方的价值取向持欢迎态度，但北约东扩、武装干涉南联盟危机、支持科索沃独立等一系列行径表明，西方势力并没有接纳俄罗斯的意图，不仅如此，还没有放过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机会。

普京主政后，立即终止了俄罗斯追求西方国家身份认同的脚步，将俄罗斯国家属性的自我界定转向了“大国”、“强国”。这个转向意味着俄罗斯从此不再对西方世界抱有浪漫主义的幼稚幻想，不再左顾右盼西方势力的脸色行事，而是要立足于自尊自强。可见，区别于西方国家身份认同的强国价值取向，其本身就预示着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抗争必将加重。

（二）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真谛

其实俄罗斯与西方势力的尖锐矛盾主要是在俄美之间，而俄美之间矛盾的症结在于对待冷战后时代全球治理问题看法的根本相左。如果说冷战时代的世界主要是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而治之，那么，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全球治理将走向何方？美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即主张由自己的单极治理建立起“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俄罗斯学者认为，如果这样，美国就将得以“利用军事和政治杠杆制定游戏规则，独断裁决从属国之间的争端，以及阻挠从属国追求获得独立的地位”^①。显然，美国的态度在俄罗斯看来是荒谬的。普京还是在承担起总统职责的前夕就明确提出了世界多极化的共治思想，认为“以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霸权为基础的所谓单极世界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国家不能接受的，它的灭亡是历史注定的。”^②

在全球治理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因为冷战时代的结束而得到改进，因此，作为新现实主义信奉者的普京深信不疑，独立国家的自助依旧是唯一可以信赖和仰仗的生存之道。国家的自助能力取决于国家的实力，这就需要“强国”。俄罗斯的强国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敌对国家的干扰、阻挠甚至破坏，美国自然首列其中，于是，俄罗斯的强国过程事实上就变成了捍卫、巩固和发展国家利益的过程。也就是说，强国战略集中体现的是普京治国理念的终极目标，而捍卫、发展国家利益，则是俄罗斯现实中旨在追逐实

^① [俄] M. M. 别别杰娃：《世界政治》，刘再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② 俄罗斯《独立报》1999年12月27日（<http://www.ng.ru>）。

现强国战略目标的基本着力点。我们注意到，普京作为代总统抛出“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执政宣言后，在2000年的上半年，即在他荣登总统宝座的前后（3月26日以超过52%的选票当选总统，5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宣誓就职），接连签署批准了三份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文件：一是1月10日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全面阐释了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问题，深刻揭示了强国战略、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二是4月22日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针对如前所述的北约东扩等事件给俄罗斯带来的严重威胁，突出强调了捍卫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防御能力，尤其是拥有在任何条件下对任何一个侵略国家或者国家联盟造成应有打击的核能力；三是6月30日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将维护国家利益置于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提出务实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以务实性为主的外交方略，以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何为“国家利益”？无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还是世界各国相关的官方文献，对此概念的解读都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更多的是存有各自特点的不同表述。究其缘由，正如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所言：“国家利益的概念包含两重因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即在逻辑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是由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因此，前者有相对永恒存在的必然性，后者则依环境的变化而变化。”^①也就是说，人们在逻辑上所要求的、或者具有相对永恒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即“生存”。汉斯·摩根索认为，“生存是根植于国家利益概念内的仅存的内涵”）层面容易达成共识，而对由具体环境决定的国家利益的理解，则因环境的不同而必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差异。

普京行使总统职责伊始，俄罗斯政府就对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②。如果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的生存环境视角审视问题，可以认为，其国家利益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利益。苏联垮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恐怕谁都不会否认，苏联经济的失败是苏联垮台的根源，因为经济是基

^① [美] 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Hans Morgenthau: The Dilemmas of Politic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页。

^② 例如，2000年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指出必须确保四大国家利益：第一，确保在多极化战略格局中成为重要的一极，保持大国地位和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第二，确保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确保经济稳定和发展，保证人民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及精神文化的发展；第四，确保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和宇宙空间的安全，能够自由出入世界最重要经济区和利用交通线。参见友谊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军事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础。普京政权要使俄罗斯得以生存，并实现强国的既定目标，必须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大力践行发展利益，努力为广大民众谋求福祉，这实际上也是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需要。二是安全利益。俄罗斯是一个地处欧亚的内陆国家，没有天然保护屏障，被形容为“没有护栏的婴儿车”。于是，疆域越大，国家也就越安全，早已成为深入俄国人骨子里的思维定势。苏东剧变后，俄罗斯骤然丧失了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一下子丢掉了大约2 000公里的战略纵深。这种情形之下，保住独联体区域这一后苏联空间，以此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略依托，以及走向强国的战略支点，便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重中之重。

（三）发展与安全利益格局的架构

发展与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经济发展了，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提升了，国家应对安全环境及其变化的能力就将增强，也将扩大国家安全战略手段的选择空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是相对安全的，才可能做到全神贯注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过，发展与安全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的相互依存固然是必要条件，却不意味同时也是充分条件。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了，有时为了扩大发展利益，需要在安全利益方面作出一定的妥协或者让步；而有时为了维护安全利益，则需要在发展利益上作出必要的付出或者牺牲。

在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不要说已经成为久远历史的沙皇俄国，就是苏联，也是一向把安全利益置于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要害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总是把安全利益置于发展利益之上，其结果可谓“鸡飞蛋打”。普京大有不同，尽管他也认为安全利益在整个国家利益格局中占居核心地位，但他并不认为安全利益时刻都在发展利益之上，关键是看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的现实威胁是什么。如果威胁主要来自经济发展领域，且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安全利益状况基本可控，那就可以考虑将发展利益置于首位。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审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变动的剧烈影响，普京执政伊始就已经把竭力捍卫后苏联空间这一势力范围纳入到了国家安全战略议程，那么，正如有学者所言，自然也就“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外交存在和外交资源，因为有些重要地区一旦退出，以后国力恢复了也会难以进入，同时还会失去外交折冲所需要的外交筹

码”^①。可见，地缘政治原则是普京政权所坚守的国家安全利益之底线。

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协同推进属于最佳状态，普京精英团队所走的是次优选择的路线，即针对具体的国情环境时而更加注重发展利益，时而更加注重安全利益，试图以二者格局架构上的暂时失衡策略达到未来均衡布局的战略目标。

二 普京首轮总统生涯中发展利益的优先践行

2000~2008年，普京以首轮、两届的总统执政生涯载入俄罗斯发展史册。这八年中，普京总统在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两个方面并不是同时发力，而是有张有弛，重在优先践行发展利益。

（一）优先践行发展利益势在必行

世纪之交普京接手的俄罗斯经历了三次瘦身：一是1989年东欧剧变，过去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盟友一个个地“脱俄入欧”，苏东集团彻底地不复存在了；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的法律继承国，它的体量相当于苏联的65%左右；三是叶利钦执政时期持续多年的“产量下降”，使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几乎又缩小了一半，导致其1999年的世界经济排名从1991年的第9位跌至第23位。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

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普京政权迅速反应，明确了以下三点至关重要的认知：

第一，内部威胁是首要的。普京主政时，来自外部的对于生存环境的挑战明显加重，尤其北约东扩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波兰、捷克、匈牙利于1999年3月正式加入北约）。尽管如此，普京精英团队的基本判断则是，经济的危机状态、恐怖主义的猖獗、民族主义和宗教分离主义的增长等内部威胁是第一位的，政府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履行国家的内部职能方面。

第二，经济安全最为关键。威胁（危险）与安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俄罗斯学者认为，“安全是指某一具体系统处于受保护状态，使其能够免受危险，或能够防止和排除危险，或将危险降至最低程度”^②。普京主政后出笼的2000年

^① 陈锋、薛兴国主编：《世界军事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② [俄] A. X. 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魏世举等译，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将安全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信息、生态等诸多领域，但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最为关键的”。

第三，发展和稳定经济是头等任务。普京于2000年3月21日（在俄罗斯城市联合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即还是在正式登上总统宝座之前，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和稳定经济是国家最主要的头等任务”，并且提出了具体发展指标的初步设想——“我们非常希望GDP达到哪怕是7%或者8%的水平，最好是达到10%的水平”。普京总统正式就职仅仅两个月后（2000年7月8日）就作了他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报告，其中强调指出，“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重的强国的基础的基础”。

优先践行发展利益，即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对于普京政权而言势在必行，并且迫在眉睫。在普京首轮总统生涯当中，这一执政理念贯穿始终。

（二）践行发展利益的主要举措

2000~2008年期间，普京践行发展利益的举措主要有三：

第一，修复国家权力。普京反思叶利钦盲目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惨痛教训，认为“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①。旨在修复国家权力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通过打造政权党和修改国家杜马代表产生办法，切实加强中央政权的统一权威。普京先是于2001年年底将多党合并组建起“统一俄罗斯”党，使之迅速取代俄共成为主导议会的第一大党，同时促使俄共逐渐成为建设性的反对党。随后修改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关键点在于取消了“混合选举制”，全部改为“比例代表制”，从而使独立议员团不复存在。这样，普京不仅能够完全控制政府，也能够通过政权党做到有效地控制议会。另一个重要步骤是，通过建立垂直管理体系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先是将全国划分为七大行政区，普京直接向各个行政区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接下来一举取消了地方领导人的直选制度，改由联邦总统提名，地方议会确认，再由联邦总统任命。还建立起了统一的法律空间，明确规定地方法律必须服从中央法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步骤，就是强力向恶意操纵媒体、经济金融等领域的政治寡头宣战，对他们采取打击、分化、规制、利用等措施，迫使

^① 《普京文集》（中文版），第10页。

其守法从事经营活动，停止不正当的政治干预。

第二，壮大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叶利钦时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结果既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被少数私人寡头据为己有，而并未出现产权明晰后的经济增长，又使政府严重丧失了财政收入来源，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普京决定走与自己的前任不同的道路，在国家权力基本得到修复的情况下，以2003年俄罗斯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入狱为标志，拉开了“国有化”的帷幕。石油、天然气等矿产企业成为国有化首当其冲的对象，因为此时国际市场上大宗产品尤其原油价格开始走高。俄政府先是启动了开采税改革，规定“可利用矿物开采税”的税收标准与国际市场价格直接挂钩，从而使俄罗斯所获得的石油红利的绝大部分被国家财政收入囊中。其后，再以兼并、收购、参股等各种方式对石油、天然气企业实行国有化，使之彻底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和政府的“钱袋子”。还有，政府直接出资组建了一批国有工业企业和金融公司（国家公司），目的是在俄罗斯振兴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第三，改善人民生活。普京的强国理念或者强国战略之所以得民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强国”具有“富民”的内涵。要将强国富民的执政理念付诸于实践，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一定的经济财力作为支撑。而当普京即将结束他的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时候，这样的条件初步形成了。普京在2004年4月所作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指出，“过去四年我们越过了一个艰难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多少年来我们首次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稳定的国家，一个在财政和国际事务中独立的国家。现在我们新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实现高水平的生活，即安全、自由和舒适的生活”。从普京首轮、两届总统任期的总体结果看，俄罗斯的民生改善涉及方方面面，成效是显著的。例如，职工实际工资的增幅始终高于GDP的增幅和通胀率水平，2000~2008年期间增加了3.4倍，对退休金的基本保障是实施指数化政策，其增幅也是明显的，同期增加了2.8倍^①；涵盖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贫困阶层的人数在减少，生存状况在改善；普京特别关注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通过践行上述发展利益的三大核心举措，普京政权所取得的业绩是相当突出

^① Кудрин А., Гурвич Е.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 12, декабрь 2014.

的，集中表现为：第一，经济发展了，2000~2008年间的GDP增长了83%，年均增长率为6.9%，比同期世界平均4.3%的增速高出了2.6个百分点，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增加了4倍多，即由0.6%上升到2.7%，得以重新跻身于世界大国前十位之行列^①。第二，就是我们刚刚阐述过的民生的极大改善；第三，经济发展了，民生改善了，随之，俄罗斯终于迎来久违了的社会稳定。

（三）谋划安全利益的实施策略

进入21世纪出现的普京新政，迅速确立了强国诉求的总体方向和经济优先的根本途径，这为谋划安全利益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鉴于尚难以对本国未来的发展状况作出准确的战略评估，也难以准确预测国际关系的互动需求及其结构变化，普京新政还曾精心聚焦面向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实施策略的选择。

总体上，旨在为国内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国际环境，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停止了一度热议的诸如“大西洋主义”“泛太平洋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等等说辞的“主义”之争，转而“采取非常坚决地只维护俄罗斯切身重要利益的方针……在其他问题上，可以坚持原则性但非对抗性的立场”^②。实际上普京新政并未摆脱“主义”的干系，所采取的不过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灵活务实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本质上是策略，但在当时俄罗斯国力极度衰败的历史背景下，事实上也构成了普京政权出自理性考虑的一种“战略替代”^③。

不言而喻，俄罗斯面向国际社会谋划安全利益实施策略首要考虑的对象是美国，而面对美国的所谓“实用主义”的真实内容有时是示好，比如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发后，普京是第一个打电话慰问美国小布什总统的外国领导人；有时是让步，比如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普京当局最终同意美国军事力量有条件地进入被俄罗斯视为“禁区”的中亚；有时是妥协，比如2004年对于北约的第二次东扩（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表现出无质疑的默认态度，普京甚至放言，如果北约给予俄罗斯否决权，那么俄罗斯也可以考虑加入北约；有时是忍耐，比如2003~2005年在后苏联空间二连三发生的“颜色革命”，尽管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

^① Кудрин А., Гурвич Е.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②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③ 参见程伟：《俄罗斯对外战略抉择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

满，但终究还是理智处之。示好、让步、妥协、忍耐，俄罗斯在安全利益方面从长计议，尽其所能地规避与美国的直面对抗，目的是为践行发展利益扫除障碍，为尽快恢复和壮大国力换取喘息之机。

三 普京复任总统后安全利益的迅速提升

2012年普京复任总统后，旋即重新摆布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关系，即一改先前在安全利益上低调以求尽快放大发展利益的套路，转向重点关注并迅速推进安全利益的提升，以至于不惜以难免出现发展利益的暂时受损为代价。

（一）俄格“五日战争”回头看

2008年8月8日，正当世界目光聚焦北京奥运会马上拉开帷幕的时刻，格鲁吉亚军队悍然出兵南奥塞梯，炮轰其首府茨欣瓦利，并袭击了驻格的俄罗斯维和部队^①。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和在黑海度假的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迅速作出反应，一场自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首次跨境大型军事行动立即展开。8月13日，在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斡旋下冲突各方达成停火协议，俄格“五日战争”告一段落。格鲁吉亚以卵击石，不仅在军事上落了个完败的下场，而且从此丧失掉了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俄罗斯以国家杜马表决的方式承认它们为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今天我们回眸俄格“五日战争”，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第一，俄对格大打出手的真实原因何在？第二，俄出兵格时处在怎样的历史节点？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以持有俄罗斯护照的南奥塞梯民众（俄罗斯将其视为自己的国民）以及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受到格军的伤害为由出兵，这不过是俄罗斯的外交说辞。众所周知，格军出兵南奥塞梯的主谋是凭借2003年“玫瑰革命”登上格鲁吉亚总统宝座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他极端反俄，极端亲美，不仅在后苏联空间掀起了第一起旨在摆脱俄罗斯、融入西方世界的“颜色革命”，不仅大肆鼓动独联体的其他国家步其后尘，而且，最让俄罗斯难以容忍的是，还竭力要把格鲁吉亚尽快地带入北约的阵营。北约也曾公开讨论过格鲁吉亚

^① 格鲁吉亚境内的俄罗斯族裔占多数的南奥塞梯自治州，一直以来有着与俄罗斯境内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合并的政治诉求。苏联解体之初，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在争取脱离格鲁吉亚的斗争中遭到格军的武力镇压。为了管控冲突，由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三方组成了混合维和部队。普京上台后，还向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这两个地区的民众颁发了俄罗斯护照。

加盟的可能性问题。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借机发力，严惩格军，其深层次的真实用意，就是以武力警告萨卡什维利以及北约不要触犯独联体区域这一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的底线。同时，对于也有意加入北约的摩尔多瓦和阿塞拜疆而言，俄罗斯果敢、猛烈的军事行动还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前文曾经提到，2004年北约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东扩时，俄罗斯予以默许；2003~2005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颜色革命”时，俄罗斯予以忍耐。可是这次，当萨卡什维利政权武力镇压反叛省份的时候，俄罗斯不再视而不见，不再忍气吞声，而是对格鲁吉亚予以毁灭性的军事打击。究其原因，正如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所言：“到了2008年8月，许多俄罗斯人开始相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复苏已经取得成功，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动荡和俄罗斯军事实力的衰退在普京执政的国力巩固时期已得到扭转……对格鲁吉亚的入侵以及对格鲁吉亚闹独立的地区的支持说明，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战略间歇期至此结束。”^①笔者认为，杰弗里·曼科夫的这段话是对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时所处历史节点的精准诠释。

原来，2008年8月，正当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向世人展现新发展新实力新形象的时候，俄罗斯也在运作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即以武力教训格鲁吉亚的方式进行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天平向后者偏移的预演或者彩排。领悟到这一点，就不会对2012年普京复任总统后俄罗斯安全利益的迅速提升有半点惊诧，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对于俄格“五日战争”回头看的主要价值之所在。

（二）乌克兰危机在所难免

俄格“五日战争”之后，美俄关系一度大有急剧恶化之势。然而，此时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改变了事态发展的轨迹：美国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元凶，奥巴马新政被迫也是借机大幅度调整美国的内外政策，包括对俄罗斯施用“重启美俄关系”的安抚策略；俄罗斯是在源于美国并迅速波及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09年GDP的降幅高达7.8%，在此背景之下，“梅普组合”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设法使俄罗斯尽快地走出经济困境。

2012年，也就是普京重返总统宝座的这一年，俄罗斯经济终于恢复到了危

^① [美] 杰弗里·曼科夫：《大国政治的回归——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黎晓蕾、李慧容等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247页。

机前的水平。普京深知本国经济的恢复主要还是得益于能源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迫在眉睫，但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能谋划做长线。与之不同的是，基于地缘政治、战略需求、大国博弈等多方面的考虑，普京认为当下俄罗斯在外交领域则不可贻误战机，必须积极应对，主动发力，重要的抓手就是构建欧亚联盟。由此，乌克兰问题浮出水面。

我们注意到，2011年9月24日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统一俄罗斯”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议由普京作为该党候选人参加新一任总统大选，仅仅10天过后，即10月3日，普京就在《消息报》发表了题为《欧亚新的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天》的文章。尽管表面看欧亚联盟是以经济联盟为核心要义，但无论如何，它是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属性的。据说普京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谁不为苏联的毁灭感到惋惜，谁就没有心肝；谁要是想恢复以前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普京积极建立欧亚联盟，就是旨在以智慧的方式维护和巩固后苏联空间的存在，这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称得上是头等大事。

那么显然，把本属于后苏联空间势力范围的乌克兰拉进欧亚联盟，使其不去加入欧盟，更为重要的是，进而使其避免加入北约，是普京精英集团决定建立欧亚联盟的一个秘而不宣的深层次考虑。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一定要继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定要把被美国外交家布热津斯基称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的乌克兰纳入自己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势力范围。于是，在乌克兰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完全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谈到乌克兰国内的选边站队，由于各种派别以及东西部地区民众意见的根本对立，也不可能出现任何一方妥协的结果。在这种内外势力均为零和博弈的情形之下，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实属在所难免。正是因为普京精英集团敏锐地洞察到了乌克兰局势的发展走向，便精心谋划，运筹帷幄，顺势发力，没动一枪一炮就收回了梦寐以求的克里米亚^①。

（三）俄罗斯缘何敢于对抗美国

如果把俄格“五日战争”比作俄罗斯在美国面前展示自己外交强势的预演

^① 1954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拱手送给了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俄乌多次激烈争执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但莫斯科一直未能如愿，基辅政权也始终没有取得对克里米亚这个亲俄的自治共和国的控制权，克里米亚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不能失去克里米亚，这被俄罗斯视为“红线”，除了历史的、民族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在于该半岛的西南端拥有塞瓦斯托波尔天然良港。那里驻扎着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俄唯一全年都可以通航的军港，也是俄扼守黑海门户的军事枢纽。通过黑海这一出海口，俄可将势力拓展至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是俄对周边施展大国影响力的重要跳板。

或者彩排的话，那么，一举收回克里米亚以及将乌克兰的东部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便可视为俄罗斯向美国“秀肌肉”大戏的正式上演。人们不禁要问，与美国实力相差悬殊的俄罗斯难道就不怕美国动武吗？倘若美国对俄罗斯动武，可以想象，胜方不说一定是前者，但肯定不会是后者。然而在笔者看来，俄罗斯怕不怕美国动武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俄罗斯的预判是——美国不会动武。主要根据有三：

一是，从美苏冷战时期的历史看，由于双方均拥有置对手于死地的核打击力量的恐怖威胁，避免彼此之间直接的武装冲突，抑或双方不直接开战，早已形成两个超级核大国主观上的高度默契。在当下的美俄之间，“大国无战争”的传统默契仍然是其双方的共同遵守，且是具有常态化的高度共识。所指出的这一点，属于俄预判美不会动武的经验演绎。

二是，普京治下俄罗斯巩固后苏联空间势力范围的举动，包括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强势表现，与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宗旨截然有别，其目的不过是在追求既有的局部性或者区域性权力的延续，以此作为谋求本国安全保障以及维护大国地位的手段，而不是“帝国思维”，更不是“帝国行径”，对此，美国显然是清楚的。还需指出的是，美国对俄罗斯后苏联空间的围堵、挤压乃至颠覆活动在先，普京重返克宫以来的“外交强势”实际上是“被逼反弹”或者“被逼防范”，对此，美国也是心知肚明。可以认为，俄罗斯始终是在防守，当下的以攻为守，事实上也没有改变防守的本质。所以，俄罗斯判定，美国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俄罗斯还以颜色，但动武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三是，俄罗斯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头号对手，这或许是俄判定美不会动武的更为重要的因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说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地衰落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从趋势上看，超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2011年美国着手实施以“重返亚太”和“转向亚洲”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再平衡”。这一切均表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实实在在的头号对手。于是，俄罗斯确信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在中国而不在自己。

四 普京治下俄罗斯强势外交的后果研判

普京复任总统后，俄罗斯的外交走强，其后果如何，值得认真研判。

（一）安全利益端：紧张但并非危险

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发酵。美国以及北约不断地对俄罗斯施以各种方式的军事威慑，而且在2016年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决定，从2017年起要在欧洲进一步加大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部署一支4200人的常驻的多国部队以及启用位于罗马尼亚的反导系统等。俄罗斯毫不示弱，以加强西线军事力量和在欧洲边界增加空中、海上行动等予以反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冷战后时代的“冰点”，甚至有舆论认为已经出现俄美“新冷战”。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主要是与美国的关系空前紧张是事实，但如果仔细辨析则不难发现，对于俄罗斯的外部安全环境而言，紧张并非意味着就是危险，更确切地说，紧张程度的加剧并不意味危险程度的加大。

第一，北约东扩的计划起码是暂被搁浅。乌克兰危机本质上是美国继续推进北约东扩和俄罗斯没有商量余地予以坚决抵制二者激烈角逐的产物。现在，西方世界发出了改变行动计划的信号，如2016年3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十四届诺贝特·施梅尔策讲座时说，“毫无疑问，乌克兰在最近20到25年内不能加入欧盟，对于北约也是如此。”迟滞甚至阻止北约东扩，对于当下的俄罗斯来说，起码是阶段性地排除了最大的安全隐患，这实际上也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行动方案中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因为，俄罗斯守住没有北约侵蚀的后苏联空间，比起面对北约在欧洲针对自己军事存在的增大要安全得多。从这一点看，俄罗斯所处的国际环境虽然看上去很紧张，但实际上可控。

第二，美对俄军事上的高压态势主要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老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迅速改善，老欧洲国家中的鸽派势力日渐提升，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乌克兰危机给美国提供了重新动员老欧洲国家继续打压俄罗斯的机会，而加大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同时又是对担惊受怕的新欧洲国家的安抚。需要认识到的是，与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同，乌克兰危机后出台的美国主要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再平衡”，与其说是战略不如说是策略，因为美国只把中国看成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对手。

第三，乌克兰危机僵局中的俄美开始对话。俄罗斯有过苏联时期10年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的历史记忆，又正面临糟糕的经济表现，在许多人看来，2015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发起的对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干预行动是普京的“政治豪赌”。普京的目的是多重的，如打击恐怖分子（据说在 7 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中，大约有 5 000 名是来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公民），使其军事存在长期化（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海军基地），在中东势力格局重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中东乱局意味着传统势力格局业已崩溃）等。还需看到的重要一点，就是以此破解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只对抗、不对话的僵局，因为在反恐问题上美俄必须相互借助对方的力量。2016 年 2 月以来，美俄多次就共同打击“伊斯兰国”问题展开对话，并启动讨论叙利亚政治和谈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尽管分歧依旧严重，对话时断时续。一方面有威胁，但另一方面又有对话，就不构成致命的危险；甚至可以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安全 = 威慑 + 对话。

（二）发展利益端：困难与机遇并存

俄罗斯扼制住了北约进一步东扩的企图，且与美国、西方的紧张关系得以保持在可控状态，这说明普京的强势外交在安全利益端是有成效的。获得收益就要付出成本，俄罗斯发展利益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是源于美国公开主导下的西方经济制裁，要害是切断了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渠道。有资料显示，俄罗斯外债的持有国，也就是俄罗斯的境外融资国，大部分均为参与了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家。以 2013 年的数据为例，俄罗斯的最大债权国是法国（大约 500 亿美元），其次是美国和意大利（分别是 300 亿美元上下），再次是奥地利、德国、荷兰和英国（200 亿美元左右），再往下是瑞典（大约 100 亿美元）^①，余下的国家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二是源于美国暗中助推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乃至持续低迷。2014 ~ 2016 年，全球油价从每桶大约 100 美元暴跌至每桶大约 30 美元。石油作为商品，其价格的波动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但石油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商品，政治背景经常成为其价格波动的重要的辅助性因素。近几年来石油严重供大于求，但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直到 2017 年才开始启动减产计划（日减产 120 万桶），这不能不认为其中的奥妙之一是暗含着美国因素。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的里根政府就曾利用石油价格战为颠覆苏联铺平了道路。

当前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局面是严重的，但也并非没有希望。

第一，国内政局基本稳定。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特点是经济衰退、社会动

^① Ершов М. Ка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ужна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анкций?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 12, Декабрь 2014.

荡、政局不稳。与之不同的是，俄罗斯当下的经济衰退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迹象，经济危机不至于演变成为经济崩溃，国内从上到下基本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况且，俄罗斯业已减轻了北约东扩的原有压力，打破与西方的封冻关系注定只是时间问题，这无疑也有利于国内政局的稳定。

第二，摆脱原料经济发展模式已成共识。事实上俄罗斯摒弃传统发展模式的任务早已刻不容缓，但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条件下实施起来却异常艰难。全球金融危机时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倒逼”机制，但随着油价的反弹，原料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死灰复燃。乌克兰危机后的西方制裁与石油价格的持续低迷，促使俄罗斯推进创新发展战略形成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共识。普京总统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曾这样表述：“所谓的制裁和外部限制，是让我们更有效、更快实现既定目标的刺激因素。”梅德韦杰夫总理说：“当前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很高，因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发生了全面的转变。”^①

第三，创新发展已有起色。面对尖锐复杂的经济形势，俄罗斯政府出台了稳定宏观经济、启动供给管理、推动国内开发、加强投资拉动等一系列措施，2016年已显现出一些成效。例如：轻工、机器制造、化工等工业生产止跌回升，前三季度整体工业呈现小幅增长，GDP下行态势有望触底；通胀率大幅回落，前三季度仅为4%稍余，失业率控制在6%以下，宏观经济形势趋于稳定；西方制裁背景下的外部经济联系有所拓展，已有40多个国家在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洽谈建立自贸区问题，其中，与越南的自贸区协议已于2016年10月4日正式生效。

（三）发展与安全：双重挑战仍在路上

无论安全利益端还是发展利益端，俄罗斯的情况都是既有不确定因素，也有确定的因素。

在安全利益端，俄美之间的“非敌非友”不过只是现实当中的关系架构，未来的关系属性的演化态势不明朗，充满变数。但确定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斗而不破”将是常态。俄罗斯的主要对策，一是试图学会在紧张而非危险的外部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二是拓展多边外交，广交朋友，所谓的“向东转”以及普京新近提出的打造“大欧亚伙伴关系”等，就是为此而采取的实际步骤。

^① http://www.guancha.cn/medvedev/20150927_335776_s.shtml

在发展利益端，俄罗斯经济深陷困境，但考虑到国家债务规模相对较小（2015年俄罗斯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0.4%，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为104.5%，发展中国家为44.4%，世界平均水平为80.7%^①）、已成功实现“金融去美元化”（在没有限制资金自由流动和没有对外汇进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俄罗斯的金融业、银行以及货币体系的运转基本正常）以及初步显现经济向好势头等因素，可以肯定，俄罗斯经济不会崩溃。至于俄罗斯何时能够走出经济困境，抑或潜在的希望何时能够变成现实，目前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

显而易见，俄罗斯仍然面临发展与安全的双重挑战。进一步分析，倘若安全利益端的俄美关系得以保持“斗而不破”，那么，当下普京政权面临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在发展利益端。从哲理上讲，如前所述，发展是安全的根本保障。审视现实，发展更是第一要务。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2016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是考验普京政权的两个关键节点。国家杜马选举已经如期（9月18日）举行，“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为54%，获得了450个议席中的343个，刷新了2007年创下的315个席位的记录，普京政权成功闯过民意信任检验第一关。如果下一步普京谋求总统连任（虽无定论，但无悬念），不难想象，问题不在于他不能战胜别人，因为在他面前不大可能出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不在于他在安全利益端的既有表现，因为国人对此是满意的；而在于选民对待经济困难形势下普京谋划和践行发展利益的认可度，以及对于普京治下的经济走势抱有怎样的预期。据此，有理由预判，也有迹象表明，普京政权对于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二者关系的摆布，很有可能将进入到一个向回归发展利益端调整的新的拐点。

（责任编辑 李中海）

^① Мау В. Антикризисные меры ил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рефор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2015 году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 2, февраль 2016.